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WAI GUO XUE ZHE
PING MAO ZE DONG
第三卷



思想的永生

萧延中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4 3420 5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第三卷

思想的永生

萧延中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2783/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第3卷: 思想的永生/萧延中主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6
ISBN 7-5008-1910-2

I. 外… II. 萧… III. 毛泽东-研究 IV. 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674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7-021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兴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4. 625
印 数:	8095~11094 册 (平)
定 价:	20. 30 元 (平)

值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诸位专家在审读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委 会

顾 问：廖盖隆 林茂生 李君如
主 编：萧延中
副主编：王应一 何祚康 张惠才
杨 德 唐秀兰

目 录

第三卷 思想的永生

第七章 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综合分析（上）	(1)
导言	(1)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 (3)
毛泽东的“第二次革命”	〔美〕费正清 (15)
毛泽东思想的结构特征	〔美〕詹姆斯·R. 汤森 (40)
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与影响	〔英〕戴维·麦克莱伦 (49)
毛主义未来观中的乌托邦成分和 非理想化成分	〔美〕莫里斯·迈斯纳 (93)
毛泽东“政治参与”的含义与作用	〔美〕约翰·B. 斯塔尔 (120)
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美〕格雷姆·杨 (15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复兴	〔美〕邹说 (208)
思想的永生	〔美〕罗伯特·J. 利夫顿 (221)
第八章 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综合分析（下）	(238)
导言	(238)

- 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哲学分析……〔美〕弗朗西斯·苏 (240)
- 论毛泽东的社会变革因果观
.....〔澳大利亚〕尼克·奈特 (269)
-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
.....〔美〕佩内洛普·B. 普赖姆 (295)
- 毛泽东：科学、技术与人道
.....〔奥地利〕比尔·布鲁格 (309)
-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文化特色
.....〔美〕爱德华·S. 博伊兰 (329)
-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政治意义
.....〔意大利〕恩里卡·皮塞尔 (337)
-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学说……〔美〕詹姆斯·阿姆斯特朗 (367)
- 毛泽东的方法论体系……〔美〕朱东成 (381)
- 毛诗：地球上出了个巨人……〔日〕武田泰淳 (397)
- 诗人毛泽东……〔日〕竹内实 (404)
- 革命的领袖、浪漫的诗人
.....〔美〕聂华苓 保罗·昂格尔 (417)
- 毛泽东诗词：形式的意义……〔德〕卜松山 (428)
- 〔附〕毛泽东《不列颠百科全书》辞条 (442)

第七章

毛泽东及其思想 的综合分析（上）

导 言

在毛泽东一身兼有的众多角色中，说他首先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或许不会有人反对。甚至有学者认为，就连毛泽东那绝对自成一家的诗词，都充满了“政治”的味道，因而不少人称他为“诗人政治家”。在这个角度上看问题，“毛泽东的思想”被视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就不难理解了。这样，在国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中，政治研究是压倒一切的第一主题，毛泽东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强调，此处用为借喻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里收集的都是从纯政治角度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文章。从这些文章的论证模式方面看，又可细分为三类：

其一，政治学模式。这一研究模式以汤森和斯塔尔最为典型。汤森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主编的《当代比较政治学》第13章《中国政治》的撰稿人，其理论体系当属于结构——功能主义一派。这一分析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将“政治”分解为不同的结构要素，首先对各项要素进行独立分析，然后再从要素互动的

结构组合角度进行总体的功能评价。如汤森就把毛泽东思想划分为“革命的民众主义”、“实践性”、“辩证法”、“过程的重要性”和“通过斗争达到团结”五项相对稳定的思想要素，而政治过程的结果，则是这五项要素在不同环境下进行不同组合的表现。另外，斯塔尔的著作《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译本名为《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其各章的支撑概念分别为：冲突、行为、权威、斗争、组织、参与、文化、传统和发展。显然这是典型的政治学表述和概括方法。

其二，历史学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按历史编年的秩序，对其中发生的事件逐一叙述，从而清晰地反映出“思想”与“问题”的来龙去脉，使人一目了然。费正清的研究最为典型，麦克莱伦的研究也属于这一框架。总体上讲，施拉姆的研究也属于此类，但由于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更加专门化，因此形成了自己将“问题”置入“历史”之中的独到方式。在宏观上，施拉姆把毛泽东思想划分为1949年以前和以后两个大阶段，在各个大阶段中又划分出各个小阶段，在各小阶段中又抽象出各种“问题”。这样叙述起问题，显得格外清晰。例如，在1949—1957年这一小阶段中，施拉姆把“毛泽东的思想”归纳为“管理模式”、“发展模式”和“人民、阶级和矛盾”三大问题，可谓独具匠心。

其三，思想史模式。这种方法是由研究者选取一个自认为涉及思想发展全局的“核心问题”，通过历史事实的逐渐展开，以此证明该“问题”是影响思想性质的本质要素，从而显示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真实状态以及内在逻辑的必然性。迈斯纳等学者的文章体现了这一论证理路。

当然，“方法”没有绝对的划分，在很多情况下“方法”与“风格”会相互混淆在一起，各种流派的方法交叉更是常有事情。上述的大致划分，只不过提供一些初步和模糊的参考意见而已。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

人们通常认为，毛的政治思想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中得到发展的，并且只是到了长征时期才形成一种特有的政治观点。我想着重指出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与有效的革命行动这个目标相结合，既是毛本身思想发展方式的基本特性，也是他的政治的主要特征。我不仅试图介绍毛政治思想的史前史，而且还想把认真理解、评价毛的政治思想史前史作为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第一步。

在详细地论述了毛泽东政治实践方面的思想发展之后，这里将描述毛在长征以前的经历对他以后的政治活动的意义，以及这种经历与他尚未明朗化的政治模式之间的一致性。

毛的许多延安时期的新政策在内容上大多来自对早期江西政策的革新。虽然，当时由于毛的领导范围的扩大，他在政策运用中的自觉、自信，以及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新形势，早期的江西政策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但是，早期毛思想的每一个政策与后期的每一个政策，在内容上仍旧有一种转换的连续性。

那种企图在毛的早期经历中探寻“毛主义”的真正起源的作法，是一种不充分研究的体现。首先，从理论上讲，这种研究建

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即在毛的政治思想中，当把连续性原则从毛的政治策略的实际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时候，它的全部意义不变。这种假设对研究者来说，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它的缺陷在于与毛的理论倾向不一致。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毛本人不仅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且他主要是从经验中总结理论，而不是按先验论办事。其次，从历史的观点看，企图把从思想或行动中的连续性意义归结到毛思想的早期阶段，乃是以假定毛的政治思想发展有错误为前提的，而且每一个后续的思想不仅随着时间而发展，而且每一个后续的思想层次比前一个层次更确实、更明朗化。毛的政治活动的每一次重新筹划都为他的政治思想创造了一个新的意义世界。

如果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被看作是毛思想的核心因素，那么，在他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根深蒂固的政治思想，不再是解释毛意图的破坏性障碍了，相反，它是准确理解毛意图的关键。

毛政治活动的固有模式

尽管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末期没有对他的政治模式作过系统的阐述，但他的政治思想在那时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描述他的政治活动的固有模式了。为了把1935年以后毛的政治思想中的新东西与他的早期经验总结相区分，我们有必要对1935年作一个总结。以下我们将在三个层次上分析毛的固有政治模式：个人榜样的模式、革命战略以及政治模式。

在讨论毛的前半生的贡献时，重要的是要记住，模式不仅仅是包含特殊性在内的宏伟的智力图式。把模式当作一种可以重复的经验，这种经验既显示出如何在模式的指导下适当地行动，同

时也证明这种行动具有功利的意义。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一种教科书式的观点。就一个政治模式的革命意义而言，榜样就是正确的政治活动家。在江西，尽管毛缺乏引人注目的地方，但他的领导风格仍毫无疑问地对他的同事产生一定的影响。他的那些在以后广为宣扬的特征已在那时很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作为一个活动家，毛最显著的个人品格是他对效益的关心。从“五四”开始，毛对具体效益的关注，再加上异乎寻常的献身精神和精力就构成了他的政治活动的特色。毛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他只瞄准他认为可以达到的目标，并为这种目标争取广泛的支持。

与毛的实际倾向有直接关系的是他对准确地、客观地把握政治形势的关心，这种关心明显地表现于他在“五四”时期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作品中。毛在1926—1927年时明确告诫要作亲身的调查研究，这正是上述关心的发展，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忽视毛所觉察的作为革命潜力的发展。在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时，毛强调的是一种认识上的关心（如何把握正确的政策），而决不允许把它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论问题，或内省式的认识论问题。调查研究是一种实践的活动，它的标准就是效益。

像政策分析的所有形式一样，毛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它的推广也包含着价值，这些是他个人模式的基本部分。毛的主要政治价值是强调为群众服务。在毛的许多著作中，这条原则与他对效益的强调融合在一起。这两者结合的纽带在于，毛深信动员起来的群众是主要的政治力量。因此，任何与群众利益对抗的政策将会是无效的。对群众力量的相信及献身于他们的利益，使毛得以从对“五四”的失望和1927年农民运动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但这些失败使毛更少地直接依靠群众的自发力量，而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革命的组织。但革命的组织、党、红军或苏维埃政府利益并未取代群众的利益，毛在1926—1927年提出的“真正的革命政党”

这一概念，以及他后来一直要避免“脱离群众”的观点就蕴含着对正统性的批评。毫无疑问，这两个观点都表明职业革命家首先是群众力量的组织者。

毛的革命战略与他的政治价值观是紧密地相维系的，尽管他在1919年提出的关于不流血的社会变革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想很快破灭了，但是，最大程度的“民众大联合”的信念仍然是他政治活动的基本前提。这最明显地表现在毛对民众的人数很感兴趣。毛在1926年提出农民战略问题时，曾认为农民的人数是他们的政治潜力的证据。虽然，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以往中国历史是精华人物的历史，但他相信，目前的问题只在于把“三亿九千五百万人民组织起来”！

马克思主义对毛的革命思想的主要促进之一，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政治经济的阶级结构观念为解释社会贫困，以及组织民众以消除这种贫困提供了一种普遍的，也许是科学的框架。有足够证据表明，在1926年毛论述农民阶级的文章中，他倾向于用阶级分析法去区分不同团体的苦难和他们的革命潜力。由此可见，毛所感兴趣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生产关系。

毛的革命战略以动员群众为中心，但它又不得不对付力量上占优势的反革命势力。学懂这一课有一个过程，而且是很痛苦的。对毛的许多同代人来说，成为共产主义者就在于认识革命组织的必要性。“五四”运动证明，新中国不可能自发诞生。职业革命家必须在敌对的政治环境下工作，这样才能造成一种革命的形势。仅有个人的献身精神是不够的，协调的、富有成效的革命前的准备工作同样要求组织纪律和具有倾向性的意识形态。通过追求有限的而又能达到的共同目标而形成的统一战线是减少对抗的一个主要工具。但如果革命组织受制于统一战线而危及群众利益，那么它就失去了合理性，即使它能顺利地实行也不能完成真正的革命。

1927年的灾难所得出的基本战略教训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对生存战略必要性的回答是，把游击战和在军阀、国民党控制的农村边缘地带的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它决不是来源于理论的创新，而是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同样，毛的游击战略也是从他的革命合理性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因为游击战略是以动员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的农民并使之政治化为基础的。如果把毛的游击战略比作一种复杂的中心——边缘逻辑，那么它的基本领域就是：既定的中国政治边缘（在农村是中农和贫农）变成了政治革命中心。毛的战略思想在长征以后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尽管那时已转向全民抗战，但它仍保留了它的农村革命基础。

毛为了使他的农村革命战略得到证实，并使其合理化，就必须发展一种根据地的政治模式，以便发动农民来支持革命。这种政治模式的重要因素是关于财源重新分配的平等主义的政策、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道德标准，以及能使群众的支持化为整体的军事——政治结构。由于毛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所具有的长期和特殊的政府管理经验，政治动员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特别重要的是他发展了为达到主要政策目标而制定的运动结构，并集中于农村地区的政治。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末期，毛认定革命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人民服务。此时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起相互作用的群众路线政策仅缺少一个规范的表述而已。

毛政治活动的竞争基础

我已对毛政治活动的固有模式的发展作了论述，这种模式是毛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毛试图对这种环境作出改进这两者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很明显，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理论当

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毛的实践环境则是中国的。因此，人们很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政治文化并列起来，作为毛主义的两个源泉，或者把其中之一作为更基本的源泉。上述每一种论点都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然而在我看来，这两种见解在它们共同的假设上都有错误。这个假设就是把毛归溯到他的思想来源的水平上，这种假设意味着否定毛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很大的变革。

关于毛的最近研究中，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那种强调他的思想的中国根源的观点。例如 W·保尔以他对毛思想传统来源的令人鼓舞的分析，总结了他关于中国幸福观念的重要考察。把毛的政治基础的研究更严格地限制于文化根源上的，是 R·索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一书。他的论点是一种心理学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文化鼓励人们对社会的依赖性，因此毛的好辩的个性使他成为天然的领导者。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立刻受到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反对。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政治行为与 R·索罗门描绘的并不相似；其他人则相信对于毛思想和它的成功不必作任何非理性的解释。

墨子刻的《逃避困境》一书，就传统根源对 20 世纪发展的影响作出了更为可信的解释。他通过对出现在传统的不平等关系中的相互依赖和道德自律等方面的描述，极大地增强了 R·索罗门的心理学主题。墨子刻并不认为中国人在心理上被行为模式所束缚，而认为他们在观念上囿于新儒家的精神遗产，包括毛在内。20 世纪发展的界限是由对个人道德二律背反的乐观主义拒绝所造成的。墨子刻把这种个人道德二律背反看作是新儒学的主要假设。他说：“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从形而上学的、心理学的、政治的、经济的困难中逃出来，是固有的、强烈的、历史悠久的愿望，正是那种困境促使无数中国人满腔热情地接受陌生的、外国的东西，

献身于推翻传统的、受尊崇的制度。墨子刻的分析方法专注于思想家身上的陈旧东西，而不是关注他们自觉到的创新。对于我们试图理解毛的目的来说，墨子刻的方法论和解释的主要困难在于它假设在 20 世纪的中国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政治思想。

在 20 世纪新的、紧迫的世界里，有价值的是人们的政治行为，而不是共同的环境或文化遗产。逃避主义也许是理解墨子刻所喜爱的哲学家唐君毅哲学的关键。但毛的实践的政治事业使他以及最终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种智力和道德的新境界，这构成了中国丰富的世俗伦理传统发展的新篇章。因而，正如我们所见，中国的大众意识形态起源于政治革命和生存斗争的实际经验。

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所指出的，关于毛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因为它关系到学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常被不必要的激烈措辞所歪曲。我们在魏特夫与史华兹有关毛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中所感到的紧张，不能完全归因于相互间智力上的激动，《现代中国》上论述这个课题的一系列文章，看来是热情多于思想。讨论中两大正相反对的论题：“毛不是马克思”以及“毛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都是无可反驳的。每一方的支持者都竭力扩大自己一方的意义而否定另一方的意义。那些十分强调毛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结果主张的是，毛和马克思完全是一回事；而持另一极端观点的人力主毛是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说毛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是毛主义的主张。

确实，问一下这个问题将更有意义，即“对毛来说，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以及“说毛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什么？”我将暂缓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更直接针对毛后期关于他的思想所作的论述。然而，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是我们题中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对毛的政治学的首要影响是，它提供了一种社会动力理论和一种职业的革命组织。在 1923—1927 年期

间，马克思主义对毛思想的影响是最清楚的。尽管毛的思想在以后有所发展，但阶级斗争理论和政党的重要性仍然是他的政治学的基本方面。与马克思相比，毛的阶级观念更直接地集中于政治潜力的问题上；与列宁相比，毛的政党思想，在更大程度上牵涉到了与群众的相互依靠关系，这在1926年毛关于革命政党正统性的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根据地时期，他把这种相互依赖的政策发展成后来著名的群众路线。

对于毛的思想基础的解释之所以发生分歧，其主要根源在于知识环境的复杂性。但在毛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暧昧（这种有时是故意的）也导致了这种分歧。毛的实践指向在两个方面促成了他理论上的那种暧昧：首先，毛只在形势要求的情况下才考虑理论问题。在考虑理论问题的过程中，毛运用理论，但他并不试图产生一个完整的理论结构以与他的实践政治学的创新和成熟发展相一致。分析毛在长征前的政治思想所遇到的难题，并不在于理解他的概念化，而在于使他的政治学说的一致性概念化。这并不只是在分析毛的早期思想时才会遇到的问题。我认为，对毛的政治活动的理论表述从未是彻底的，他的政治思想一直处于政治形势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之间的含糊不清的辩证关系之中。

其次，毛为了追求效果，他似乎不得不显得顺从他的上司并勤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尽管他实际上是多么创造性地执行着他们的命令和原则。例如在1933年，毛试图使“布尔什维克化”与“群众化”统一起来。他抓住28个半布尔什维克用过的“布尔什维克”的标签，以表明他关于群众运动和地方政府的新倾向具有意识形态的纪律和效能。有典型意义的是，毛并没有表面利用含糊不清的“七四”宣言，他仔细地揭明“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真正意义，然后才运用这标签。他把这个概念运用到新的实际环境